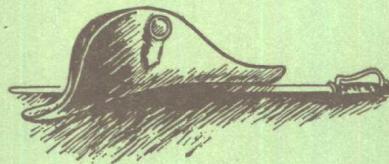


拿破仑时代

上 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



商务印书馆



拿破仑时代

上 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

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XIV

NAPOLÉ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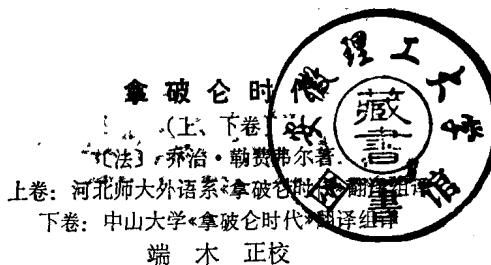
Par

Georges Lefebvre

Sixièm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9



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下卷：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2 5/8 印张 530 千字

1978 年 10 月第 1 版 1978 年 10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14 定价：2.5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出版的题为《民族与文明》丛书的第十四卷。《民族与文明》是一部以欧洲和法国为重点的世界通史丛书，其中第十三卷《法国革命》^① 和第十四卷《拿破仑时代》是乔治·勒费弗尔 (Georges Lefebvre) 撰写的。

乔治·勒费弗尔 (1874—1959 年) 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从 1914 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四十五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1932 年他继阿尔贝·马迪厄当选为“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志主编，1935 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勒费弗尔保持了马迪厄学派注重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推崇雅各宾民主专政的史学传统。他对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法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著作。关于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都有专著论述。

本书是勒费弗尔于三十年代初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时，边讲课边撰写的，1935 年完稿出版，到 1953 年已出了第四版。他的学生阿尔贝·索布尔在他逝世后负责整理他的遗著，1965 年印行了由索布尔增订的第五版，1969 年值拿破仑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又印了第六版。索布尔对原著正文增订不多，但对勒费弗尔开列的参考书目则有所补充。这部书从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一直被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并译

^① 《法国革命》一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约、萨尼亞克合著，1930年初版；1951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年印行了第六版。

成多种文字。

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和欧洲的这段历史。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尽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法英、法俄争夺霸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但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揭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仑所追求的各种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断言：“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161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于拿破仑的“性格”：“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同上），并概括地说：“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68页）

我们并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但是任何性格都脱离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抽象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中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既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以致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益。于是他又用“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64页）来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争总是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归根结蒂拿破仑“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去寻找。正如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②这就是说，拿破仑建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③正是拿破仑的不断战争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93页。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③ 同上，第158页。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为“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144页）他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国的一部分，他只把远东地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的战争，远东早已被西方列强侵占了，“欧洲的内哄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299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内容，中译本书名增加“时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下卷由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全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参照英译本进行了校订。中译本除增加一些译注外，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别附在各编、各章节的页下。我们只择其要者选录，把参考书目集中附在上下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第一章 法国和英国：战端重启 (1802—1805年)

从亚眠和约到1805年战争之间，在这段关键性的岁月里，拿破仑的个性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英国签订的和约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只要大陆战争没有重开，使波拿巴能在1799年上台的解决办法——一个扩大了领土而爱好和平的法国同称霸海洋的英国对峙——并没有被废弃。普莱斯堡和约之后，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毁

阿丁顿内阁决心认真试行保持和平，并且相信和平会保持一段155时间；这是很难加以反对的。他废除了所得税，把海军开支削减了二百万英镑。海军大臣圣文森特暂时停止造舰，并且解雇了海军造船厂的工人。木材供应商由于他着手调查他们侵吞公款的案件，和他闹翻了，于是造船厂的材料供应很快就断了。然而政府在自己党内遭到了反对。托利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信，和平会使法国重新武装起来，从而对不列颠帝国发动新的袭击，所以他们就象一百年前辉格党人一样呼吁作战到底。这些托利党的反对派控制了一部分报纸，法国的亡命者佩尔蒂埃帮助他们咒骂法国革命和波拿巴的军事独裁。英国商业界人士在托利党这两派意见之间举棋不定。和平危害着很多行业的利益：许多军事工业苦于停156工；英国商人就要失去他们对波罗的海和德意志商业的垄断，尤其

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归还法国的殖民地意味着英国贸易的减少，仅仅荷属圭亚那的贸易就减少了一千万英镑。最后，在亚眠和约签定之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大下降，以至中立国，特别是美国，也认为和平是一场灾难。然而一般都认为这些不幸只是暂时的。这些托利党人敲起的警钟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但在海上和殖民地，危害似乎还不是迫在眉睫。至于大陆，英国舆论对它并不过于关切。真正问题却是要弄清楚：波拿巴是否会把法国及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的广大市场向英国的商业重新开放，因为假如不建立对英国人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英国人就会长期容忍这项条约的存在。1802年5月，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重申，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人赞成和平，就需要加速重建商业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执政的经济政策。

拿破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这的确不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并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的成果，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财政，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最后由于减少失业和增产粮食，从而确保“秩序”。因此，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一心考虑着战争的拿破仑对商业界和金融界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并到处同英国有密切联系。他对工业很感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的工业。他认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力量，象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重农主义的，随着他疏远资产阶级而考虑重新创立土地贵族，他就从另一个方面来接近这个学派。然而，正象往常一样，每当他遇到具体困难，他从来都不屑拘泥于一家的学说。虽然他偏爱农业，他却总是不愿给予出口粮食的权利，因为正象共和十年的经验所证明，面包价格一上

157 涨就会引起群众的骚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和一般平民想法一样，痛恨囤积粮食投机的商人和粮农的“利己主义”。工业危机使得工人失业，引起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需要非常照顾棉纺工业，尽管它所使用的是进口原料。

在波拿巴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之中，最需要他注意的是货币问题。英国是允许适当的有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它使物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因而对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而法国外除了银行发行的有限的纸币外，仍然不得不使用硬通货，这种通货总是被人贮藏起来，因此总感到金币不足。这种情况使法国的经济遇到了麻烦，因为资金继续不足，而且昂贵。波拿巴总是不断责备法兰西银行在贴现商业证券方面所持的过分谨慎态度，他很想看到这家银行在外地多设分行，使信贷得到广泛使用。硬币的不足使国库负担沉重，因而对国家的财政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发行指券失败之后，波拿巴无论如何不愿采用纸币，因为用纸币就要用政权力去强制流通，这样势必有损他的威望。象科尔贝尔^①在类似的情况下必须为路易十四解决财政问题一样，波拿巴也转变为重商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必须少从国外购买货物并增加出口，或征服外国，以取得金属而保护其硬币的供应。

因此执政府尽力鼓励生产，特别是生产奢侈品。1800年建立的统计局重新进行由救国委员会和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②所开始的调查工作。它通过郡守从事法国经济和人口的调查，而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了调查结果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统一国内市场而采用了十进位的公制，不过这种公制只是很缓慢地才获得通用。共和十一年芽月17日（1803年4月7日），把货币制

① 科尔贝尔（1619—1683年），1664年起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译者

② 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1750—1828年）在督政府时期曾任督政官（1797—1798年），后改任内政部长，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首次举行人口普查等。——译者

度固定在金与银的为一比十五又二分之一的比率上，但是，由于贵金属缺乏，不能保证铸造足够的硬币来代替旧通货。然而新政权坚决稳定货币，因为法郎的法定价值以白银为依据（一法郎为四又二分之一克纯银，或五克九成纯银）。而旧制度下的里弗^①从来没有过法定价值，所以计算上的货币和实际使用的货币在价值上第一次完全相符。商业的管理委托给了一个总委员会；随着帝国的诞生，商业管理又由参政院中的一个组负责。1801年3月19日，商业交易所改组了；1802年12月24日，商会重新出现了；1803年4月28日，十六个海港被指定为国际贸易港，并准予建立保税仓库。1801年底，在夏普塔尔的主持之下组织了一个“全国工业促进会”；作为内务部长，他恢复了督政府时期举办工业展览会的做法。1803年4月12日，制造业公会出现了。巴黎农业协会则于1798年就已重新成立起来。波拿巴和科尔贝尔一样，本性就倾向于通过行会进行管理。工匠会因为恢复了他们的垄断权而高兴，某些商人会欢迎那些针对家庭手工业者或雇工的管制规定。警察厅长以“公共秩序”为借口设法把面包商和屠宰业各组成公会。可是，第一执政当时还不敢走得更远，因为受到参政院支持的银行家和大实业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限制劳动自由的规定。共和十一年芽月22日（1803年4月12日）法律只限于规定商标注册制度。另一方面，财政状况也不容许波拿巴按他本来的意愿那样大举兴办公共工程，同时也沒有能力直接资助鼓励私人企业。甚至稍后到资金较为宽裕时，拿破仑也拒绝直接资助私人企业；他只给加工订货，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为了避免失业现象，拨出贷款给私人企业建立库存。因此在科尔贝尔的制度中，还没有使用的只有保护关税而已。

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表明应当采取最后这一步骤。让一巴蒂斯

^① 法国古银币，约重五克，汉译或作“金里”。——译者

特·萨伊所极力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还远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费里埃在 1805 年出版的《论政府与商业的关系》一书中仍然坚持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有人就不断攻击英国的走私活动，战争一结束，走私活动更为猖獗。棉纺工业家大喊大叫地说，如果又恢复 1786 年条约^①，则随着该条约产生的严重危机势必重现。织布业依然是极其繁荣的，纺纱业虽然有些进步（棉花进口量前十年的年平均数五百万公斤，到共和十二年上升为 159 将近一千一百万公斤），却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尤其是在高支纱方面，无人能与英国工业竞争。波拿巴没有撤销督政府对英国商品的禁令；他并且在 1802 年 5 月 19 日还批准暂时提高关税率，对英国殖民地商品的征税至少比法国殖民地的同类商品高百分之五十。

在亚眠和约以后，波拿巴并非不愿和英国订立一项商务条约。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和一些商界代表被派往伦敦；英国提议恢复 1786 年的条约，但可适当修改，并允许法国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照顾本国工业。1802 年夏天，商会宣称断然反对禁止英国商品进口，夏普塔尔建议政府接受伦敦的提议，同时要求英国按从葡萄牙进口雪利酒和波尔图酒的同样条件准许法国酒类进口，并且也允许法国丝绸输入英国。他也忠告法国不要把关税定得太高。他说：“我在等待我们的工业家开始大声疾呼。”如果给工业家适当照顾的话，这个方案是站得住的。科克贝尔却提出相反的建议：法国输入英国多少商品就准许英国输入法国相等价值的船货。夏普塔尔反驳道，这样的建议意味着颁发特许证，并会造成只对少数人有利的对外贸易垄断。夏普塔尔称之为“荒谬”的特许证制度事实上

① 1786 年的英法条约减低了英国货物输入法国的关税，以致英货充斥法国市场，打击了实力较弱的法国工业，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法国制造业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对政府不满。这个条约加深了 1789 年革命前夕的经济危机。——译者

就是后来在 1811 年实行的办法。在自由竞争和禁止通商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制定适当的保护政策的余地，如果取得英国同意的话，这是夏普塔尔所倡议的，也是法国工业非常需要的。波拿巴要在大工业家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它需要和平）之间作出抉择。最后他事实上支持了禁止通商。

波拿巴对维护和平是不感兴趣的。他告诉蒂博多：“一个第一执政不同于那些蒙上帝恩典的帝王，他们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世袭的财产……而第一执政需要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他需要战争。”他很谨慎而不公开说出这种想法，因为国民不会赞成这种想法。“让外国人先开仗，这对我更为有利。”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将是首先再动武器的人。”他既抱这种态度，当然就会鼓励他们先动手。无论如何，禁止通商保证了硬币的积累，有助于备战工作，直到变成一项战争的武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是如此。人们认为建立在 160 举债和通货膨胀基础之上的英国经济和财政结构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脆弱了。奥特里夫于共和八年、盖尔于 1801 年、拉萨尔于 1803 年，还有《政府通报》本身都用各种笔调反复表达这一意见。虽然威胁法国的危险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然而法国却又错误地认为自己单枪匹马就能使英国在经济上遭到毁灭。波拿巴也大有这种错觉，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独裁者，他蔑视这个既无陆军和又无政府可言的商人寡头统治。他把英国比作迦太基，而他自己则要扮演伽图和西庇阿^①的角色。商业条约已无人再提：有一些商船被拿捕了，因为发现它们运载了英国的货物。然而法国的对外贸易从 1799 年的五亿五千三百万法郎上升到共和十年的七亿九千万法郎。英国资本家知道经济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他们厌

^① 伽图（公元前 232—147 年），在罗马反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坚决主张摧毁迦太基。西庇阿（公元前 235—183 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败迦太基的罗马将领。——译者

弃这种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和平。

因为殖民地产品是法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以尽早收复仍旧属于法国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成为当务之急。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波拿巴就向圣多明各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杜桑-卢维杜尔这时控制了全岛，而且于 1801 年 5 月 9 日颁布了一部宪法，名义上仍属于法国，实际上归他自己统治。然而他终于向法国远征军首领勒克莱尔将军投降，但却在 1802 年 6 月 7 日被捕，解送法国，1803 年 4 月 7 日死于法国日乌堡里。与此同时，里什庞斯再度占领了西印度群岛中较小的岛屿。虽然英国不能再阻碍法国去征服安的列斯各岛，但却不安地注视波拿巴对路易斯安那的计划：北海沿岸正在准备一次远征，打算把维克托将军派往那里去。舰队预定在 1803 年 3 月启航，但是出发的时间推迟了。在准备远征期间，西班牙已禁止美国船航行密西西比河。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是盟国，荷兰受法国控制，所以墨西哥湾似乎任凭波拿巴的摆布，从而也控制了西属西印度群岛上的走私，法国在这里处于一种有利的特权地位。然而，这种前景不必英国出来干预就消失了。若干时候以来就垂涎西属佛罗里达的美国不希望看到法国在新奥尔良立定脚跟。新当选的总统杰佛逊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和加勒廷试图实行共和党的和平、裁军和压缩开支的纲领。纵然杰佛逊对法国有好感并对莫尔丰丹尼条约的签订感到高兴，他却不能不顾美国的舆论。因此他透露：如果法国留在路易斯安那，美国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将参加英国一方。1803 年 4 月 12 日，杰佛逊的大使门罗到达巴黎，带来一项波拿巴已经同意的建议：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领土。随后于 5 月 3 日签订的条约规定给波拿巴八千万法郎，在扣除应付美国的赔偿，并给办理交款的银行家霍普和巴林的佣金之后，只剩下了五千五百万法郎。

这时，起义已经遍布圣多明各全境，这是由于恢复奴隶制引起

的。在波拿巴身边的亲信随从里，白人种植场主的代言人很多（更不用说约瑟芬本人了），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在殖民地迅速恢复生产的最得力的方法。但是，恢复奴隶制并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甚至在已经实行共和二年二月 16 日法令^①的殖民地，督政府的特派员和杜桑-卢维杜尔本人都已经实行了强制劳动。波拿巴最初倾向于确认这个制度，而把奴隶制仅限于存在奴隶制的岛屿上——例如在马斯克林群岛，那里把国民公会法令视为一纸空文；又如英国占领下的马提尼克岛，那里从来没有能接到这项法令。最后，波拿巴让步了。的确，1802 年 5 月 20 日法律明确规定在殖民地将“保持”奴隶制；人们从这条法律可以推论出，在已经废除奴隶制的地方，就不再恢复奴隶制。但是，波拿巴却作出另一个决定，他命令里什庞斯在瓜德罗普岛重新实行奴隶制，因而激起了一次起义。在圣多明各，勒克莱尔宣称实行这一措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黑人都知道将要遇到什么不幸的事了，9 月，杜桑的部将克里斯托夫和德萨利纳轻而易举地在全岛发动了起义。法国军队由于黄热病而大批死亡，迅速遭到削弱。勒克莱尔病死，他的继任者罗尚博是种植场主的支持者，他在进攻黑白混血人的战争中使法军伤亡殆尽，由于波拿巴禁止这些混血人进入法国和与白人通婚，已经激怒了他们。太子港法军于 1803 年 11 月 9 日投降，少数被围困的驻防部队设法苟延残喘到 1811 年。

英国人虽不喜欢看到法国重建它的殖民帝国，但他们也不会为阻止它这样做而提早重新开始战争的。但是，威胁英国的属地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恰恰是波拿巴所干的。一个新的宏伟的设想激励着他向地中海方面扩张，这就是说，目标就是埃及。亚眠 162 和约终于使土耳其人决定同法国人签订和约（1802 年 6 月 26

^① 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4 年 2 月 4 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在法国全部殖民地上废除奴隶制。——译者

日),并为法国人开放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一个名叫呂芬的法国代办立即着手在地中海东岸各国重建领事馆。法国在1801年和1802年还分别与的黎波里的帕夏和突尼斯的別伊缔结了条约。1802年8月,一支舰队强迫阿尔及尔总督也同法国订立了条约。君士坦丁堡已经很担心法国在伯罗奔尼撒、艾奥尼纳和塞尔维亚人中间搞阴谋,并且感到有被瓜分之虞。8月底,塞巴斯蒂亚尼上校经过的黎波里前往埃及,然后又访问了叙利亚,他到处都设法和本地的首领建立联系。卡韦尼亚克被派往马斯喀特;德凯恩于1803年3月6日启航前往印度,随行的重要参谋人员之多足能把印度士兵组成若干团队。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得出结论,波拿巴正在计划对埃及和印度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为了谨慎起见,一定不让他完成准备工作,特别是不能放弃马耳他岛。但是,英国人继续占据该岛就是破坏亚眠和约。

波拿巴在欧洲大陆的政策给英国人提供了不交出马耳他的借口。波拿巴不顾席梅尔佩宁克的再三要求,拒绝从荷兰撤军,他辩解说,和约的条款还没有履行。虽然波拿巴放弃了那不勒斯的各港口和教皇各属邦,他却在1802年8月吞并了厄尔巴岛,9月吞并了皮埃蒙特,10月在巴马公爵去世之后占领了巴马。在瑞士,法国军队刚刚撤完,雷丁就在1802年8月27日夜间领导山区的一些州起义。起义者在施维次召集了议会。苏黎世、伯尔尼和弗里堡都在其掌握中。合法政府到洛桑去避难,答应沃州起义农民废除封建赋税,同时允许以国有产业来赔偿地主的损失,可是并无任何效果。因此,这个政府只好向波拿巴请求援助。第一执政于9月30日进行调停,强迫起义者解除武装。内伊进军瑞士,议会从英奥两国那里只听到一些好听的话,却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東西,只得自行解散,雷丁被捕。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同几名法国元老院议员一起讨论波拿

巴关于制定宪法的计划。波拿巴命令委员会为各州草拟宪法，草拟的条文后来附入 1803 年 2 月 19 日的“调停条例”中。十九个州各都有自己的宪法，大都规定了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尤其在以前由贵族统治的各州里是如此；在那里，宪法规定保证革命前的城市贵族的统治。这些州恢复了大部分自治权，特别是处理国有产业和解决封建赋税和宗教事务的权利。这就使得反动势力几乎在各地 163 都取得了胜利，宗教自由只在原已存在的地方才得到了保证。表现国家统一的就只剩下各州的平等权利，它们被禁止个别结盟，瑞士人在全联邦居住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国内关税壁垒的废除，以及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包括一个议会，每个州根据其重要性在议会有一个或两个表决权，还包括一个行政长官，即联邦主席的官职，由六个主要的或者说“执政的”州的首领轮流担任。波拿巴指定路易·达弗雷为第一任总督，他是一名法国的瑞士卫队前任军官，代表弗里堡州。1803 年 9 月 27 日，瑞士联邦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十年的防御同盟条约，并且重订了为法国招募四个团、每团四千名新兵的条款。但是联邦却没有常备军，而且波拿巴甚至不允许瑞士成立总参谋部。

与此同时，法国利用根据吕内维尔和约规定补偿来因河左岸被剥夺了的王侯的机会，在德意志扩充势力，进展很快。德意志帝国议会曾拒绝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解决这个问题，并授权一个委员会就此事与法国相商。奥国外交大臣科本茨企图以提议结盟来对法国施加影响，但却徒劳无益。波拿巴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已经同意共同解决此事。事实上，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所有德意志王侯都去巴黎谈判，他们以合计总额达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法郎的巨大贿赂塔列朗，以保证尽可能争得最好的土地。乔治三世自己接受了奥斯纳布吕克主教邦。美因茨的选侯达尔贝格热心为法国效劳。唯有萨克森很不高兴，因为它没有要求补偿的权利。1802